

走进两个世纪伟人的思想深处

——《毛泽东与周恩来》序*

郭汉民

(湘潭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中图分类号:A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6)01-0159-02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周恩来是最具个人魅力的两位政治家。在性格特征上,毛泽东劲直尚气,举重若轻,周恩来精细雅致,举轻若重。在相互关系上,他们的合作长达近半个世纪,这在世界政治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在思想理论上,他们的智慧均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彼此既有互补与传承的关系,也有切磋和发展的关系。在历史影响上,他们的名字、思想和事功都将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影响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人物都有比较研究的价值,比如龚自珍与魏源、曾国藩与左宗棠、康有为与梁启超、孙中山与黄兴、毛泽东与周恩来等等,但其中最令学者感兴趣,最让民众所关注的当属毛泽东与周恩来。我作为胡长明同志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之所以全力支持并指导他研究这一课题,主要是因为有如两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该选题既符合学术研究发展的规律,又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几十年来,国内外对毛泽东、周恩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献资料与专门著作大量出版。就国外而言,出现了一批相当有分量的著作,如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斯拉姆的《毛泽东传》、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所著《周恩来传》等等;就国内而言,《毛泽东年谱》(1893-1949)、《周恩来年谱》(1898-1976)、《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周恩来选集》(上、下卷)、《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经济文选》等许多资料均已出版。1993年和1998年,以纪念毛泽东、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为契机,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相继发起组织全国毛泽东生平思想研讨会和全国周恩来生平思想研讨会。这两次研讨会都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是对国内研究毛泽东、周恩来生平思想状况的大检阅。不仅如此,国内外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苏联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撰有《周恩来》的长篇论文,收录在他主编的《中国:人物与事件中的历史》一书中。该论文剖析了毛、周在对苏外交政策上的分歧,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舍维廖

夫的论文《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的报告与反“冒进”斗争》,对毛泽东、周恩来在1955年夏开始产生的经济工作方针上的矛盾及其影响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日本学者鸟居民所著《周恩来与毛泽东——周恩来试论》,是国外少有的专论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的专著。该书将周恩来的政治主张和生平置于另一政治主导人物毛泽东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在对比中描绘出周恩来、毛泽东的政治性格和政治肖像。

国内对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比较研究,严格说来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1986年,人民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联合出版方矩成、姜桂依先生撰写的《周恩来传略》,该书第八章“是人,不是神”,以大约一万多字的篇幅,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探讨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虽然是粗线条的,但却开了这方面研究的先河。此后,周毅之的《周恩来的行政哲学》、陈晋的《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石仲泉的《周恩来的卓越贡献》等,也在部分章节涉及到对毛、周的比较研究。既然国内外对毛泽东、周恩来的单独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比较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那么从学术研究本身的规律而言,对两者的个性特征、思维方式特别是各个领域的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就既有可能,也有必要。人们越来越感到,只有对毛泽东、周恩来个人的思想主张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才能走进更加真实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才能加深对风雷激荡的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理解。胡长明同志选择这一课题,体现了敏锐的学术眼光和驾驭重大研究项目的勇气。

其次,从胡长明同志的工作经历和学术积累而言,他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条件和能力。

胡长明同志从1982年起就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工作,曾担任该馆研究室主任多年。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与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纪念馆也有密切的学术往来。他长期注重收集和整理有关毛泽东、周恩来生平思想的资料,特别是对他们早年的家族背景、文化习染更有深切的了解。从1987年到199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他在

* 收稿日期 2005-09-12

作者简介:郭汉民(1945-),男,河南平顶山人,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省级以上报刊就发表有关毛泽东、周恩来生平思想方面的论文 30 余篇。1993 年到 1998 年 ,他相继单独或与人合作编写了《韶山毛氏族谱(注释本)》、《毛泽东青春岁月》、《毛泽东遗物事典》、《大智周恩来》等著作 ,为开展毛泽东、周恩来个人思想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8 年又考入湖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那时我在湖南师大添列博士生导师 ,对其了解较深。胡长明同志思维活跃 ,勤于探索 ,治学异常刻苦。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 ,研读了大量中外学术作品。就我所知 ,他对中国许多的传统古籍如《老子》、《庄子》、《韩非子》等都下过苦功 ,有比较扎实的文史功底 ,又有比较强的独立研究能力。鉴于他的工作经历和学术积累 ,我相信他有条件和能力完成这一重大课题。

胡长明同志撰写的这本《毛泽东与周恩来》,是从人格特征、思维方式特别是思想理论角度全面比较毛泽东、周恩来的极为严肃的一部学术著作。与以往的研究成果相比 ,本书至少有如下新意和创见 :

一是关于早年性格特征的比较研究。已有不少学者从家庭背景和经历入手对毛、周的人格特征进行比较。而本书则将视野进一步拓展到家族和地域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里 ,主要的社会生活便是家族生活。因此 ,家族和地方的传统思想和精神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通过对韶山毛氏族谱和绍兴周氏家谱的深入研究 ,胡长明同志认为“韶山毛氏家族的最大特点是具有从军打仗的传统 ,尚武精神十分突出” ,而“周氏家族则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 ,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 ,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前者的“武略之美”与后者的“文事之优”恰成明显的对照。在毛泽东、周恩来身上 ,人们不难看出其家族长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子。这种分析丰富了人们对毛泽东、周恩来早年性格特征形成原因的认识 ,富于学理性和逻辑性。

二是关于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 ,毛泽东、周恩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最深的两人。过去学界就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发表了许多看法 ,但究竟毛泽东、周恩来是如何从总体上认识并继承传统文化的 ,特别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核心观念和中心命题又是什么 ,还少有人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过探索。本书认为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核心观念莫过于“内圣外王”。毛泽东一生将学问与事功的高度结合视为完美的人生境界。而周恩来则极为推崇老子所说的“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 ,长而不宰” ,其经历充分体现了“不以有为有 ,因此才有有”的人生哲理。此外 ,毛泽东、周恩来虽然都主张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但他们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有一定差异的 ,毛泽东的情感取向十分明显地向传统文化中的下层文化、非正统文化倾斜 ,而周恩来则时时不忘提醒人们注重吸收上层文化、精英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他明确地说过：“在旧社会 ,劳动人民身上有不少好东西 ,但在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身上也有好的东西。”

三是关于各个领域思想的比较研究。这是本书毛、周比

较研究的重点。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受到某些流行观念的束缚 ,简单地认为“谋事在毛 ,成事在周”。即便是从周恩来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这一角度来立论的著作和文章 ,也习惯于罗列周恩来的所有正确思想 ,并比较笼统地将其称之为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至于哪些是对毛泽东的思想的阐释 ,哪些是对毛泽东原来提出而后来又放弃的正确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哪些是周恩来的独创性贡献 ,哪些是周恩来对毛泽东个别错误思想的扬弃 ,却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本书作者认为 ,毛泽东的思想与周恩来的思想当然不可等量齐观 ,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贡献者 ,其思想与影响无疑占主导地位 ,但决不应低估周恩来的宏观思考能力和决策能力。鉴于学界对毛泽东与周恩来个人思想比较研究之不足 ,本书以毛、周思想的系统比较为重点 ,并以专题的形式 ,对毛、周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领域的思想进行条分缕析的比较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有同说同 ,有异说异。这些比较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基础 ,在强烈的对比和映照中 ,呈现周恩来对毛泽东思想的补充、丰富和发展 ,凸显毛泽东、周恩来的政治性格和思维特征。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 ,胡长明同志把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归纳为以下几种关系 ,一是创始与发展的关系 ;二是相互补充、交相辉映的关系 ;三是互相借鉴、螺旋上升的关系 ;四是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的关系 ;五是先异后同或先同后异的关系。虽然这些归纳还可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但总体上来看是富于创见的。如果不经过深入的思考和对比 ,不可能得出这些结论。

本书的创见当然不限于以上几个方面 ,可以说在每一章中都有不少新意。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杨胜群先生审阅书稿时指出：“《毛泽东与周恩来》是一部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和风格等进行比较研究的严肃的学术著作 ,是目前这方面研究成果中最有分量者之一。作品对毛、周之思想和风格等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 ,不是一般性地介绍 ,而是作了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 ,资料翔实 ,论证谨严 ,富于个人的见解且持论有故。”杨先生的看法显然是客观而公允的。

要进行毛泽东、周恩来思想的比较研究 ,仅资料收集和阅读就是一件浩大的工程。胡长明同志积十多年之功 ,阅读了所有已经公开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著作以及研究他们生平思想的中外重要论著 ,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 ,其中的艰辛和努力 ,我想稍有学术眼光的读者都是能够体悟的。

作为本课题的指导老师 ,我深知研究这一课题的艰难。就学术研究的规律来说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只能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不少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也还有些内容需要补充。但不管怎样 ,胡长明同志能取得目前这样的成绩 ,是可喜可贺的。

学无止境 ,后胜于今 ,愿胡长明同志在学术之路上继续奋斗 ,勇猛精进 ,为毛泽东、周恩来生平思想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是为序。

责任编辑 :立 早

走进两个世纪伟人的思想深处——《毛泽东与周恩来》序

作者: [郭汉民](#)
作者单位: [湘潭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刊名: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年, 卷(期): 2006, 30(1)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tdxshkxxb200601029.aspx

毛泽东与周恩来性格特征比较

●胡长明

在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周恩来是最具个人魅力的两位政治家。在性格特征上，毛泽东劲直尚气，举重若轻；周恩来精细雅致，举轻若重。在相互关系上，他们的合作长达近半个世纪，这在世界政治史上都是一个奇迹。毛泽东、周恩来都是杰出的政治家，但由于出身、性格、文化习染、角色身份等的不同，他们的政治风格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求异思维与求同思维

崇尚斗争和挑战，是毛泽东人生观和思维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毛泽东的生活经历来看，家族的“尚武”精神和从与父亲的冲突中所得来的启示，无疑是形成这一人生观念和思维方法的最初文化积淀。在青年求学期间，中西方文化中有关提倡“斗争”的文化资源又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后援。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问题作过专门阐述。他认为，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他还根据列宁所说的“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的论述作了如下发挥：“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占统治地位。”“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毛泽东将这些理论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相结合，对国共两党在抗日这一共同点上的统一性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并且成功地运用以斗争求团结这一逆向思维方法，维护了矛盾同一性的暂



时绝对性和安定性。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未能将“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这一比较健全的思想很好地坚持下来。相反在1957年后还逐步地把斗争推向极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设置对立面”的命题。会议期间，他多次讲到：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上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上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周恩来出身在一个衰败的封建家庭，孔孟儒学传统构成这个家族基本的文化氛围，加之他自幼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而且很早就主持家计，备尝艰辛，所以形成了那种偏重于在动乱中求安定、在纷争中求和谐、在屈辱中求忍让、在对立中求统一的“异中求同”的思想方法。这在他于南

开中学写的两篇作文中有突出的反映。头一篇题为《子與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周恩来的观点是：“若夫中国之今日，财尽矣，德衰矣，司农有仰屋之悲，君子有道丧之慨，言利则德不足以副之，言义则民穷足以困之，是非二氏之说而法之，不足图根本之补救。民德民生，双峰并峙，两利皆举。”另一篇的题目是《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谁都清楚，老子哲学和赫胥黎的天演论是两种反差极大的哲学理论，但周恩来找到了两者之间的共同性。他写道：“惜老氏主退让，赫氏主竞争，二氏之说，容有不客一致者。语云：冰炭不同炉，二氏殆无类此耶？曰：非也。二氏固未为冰炭，且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这样的文化积淀和思维方式，成为他一生中性格的一个重要特点。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毛泽东、周恩来都兼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思想风格，但比较而言，毛泽东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热烈追求他心目中以平等为核心的理想社会模式，其执著和坚毅构成他伟人品格的一个要素。而周恩来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注重实际、审慎务实是他一贯的特点。

毫无疑问，周恩来也是为实现平等和公正的远景目标而奋斗的，但他把这一目标的实现视为一个艰难缔造、循序渐进的过程。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深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1917年，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不仅如此，他还把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日本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相结合，决心与志

同道合者在长沙岳麓山建设一个“新村”给世人提供一个理想社会的蓝本。尽管这种“新村模式”在当时并未诉诸试验，但却在毛泽东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再是空想的，而是有了科学的依据。延安时期，他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成功地达成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和平衡。一方面，他以自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光明前景的无限向往和坚定信念去鼓舞人民，唤起他们改造现实的热情。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要依赖于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激情逐渐盖过了对客观现实的冷静分析。从1955年起，他开始以高强急迫的姿态推动社会转型的步伐，结果发展的速度之快竟然出乎他的意料。他曾对秘书田家英说：我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么高兴。到了1955年，当我看到那么多农民参加了农业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开始高兴了。

与毛泽东相比，周恩来是“建筑师”而不是“诗人”。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都没有过激的理想主义的冲动。周恩来信仰共产主义，富于远大的理想，但他又是一个相当务实的人，善于对眼前的局势作出尽可能切实的判断，并以真实可见的成就稳健地推动历史的进程。在党内，周恩来第一个提出了“左”倾并不比右倾好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已有革命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反对李立三关于布置夺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武装暴动的主张。后

来，也正是他和瞿秋白一起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日本学者认为，改变中国共产党命运的历史转折，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周恩来在处理这一复杂政治问题时表现出超人的洞察力、判断力以及灵活有效的外交手腕。正是他现实主义的处置方法，才使中共开始从此步入坦途。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又一次谈到防“左”的问题。他说，“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时间短，易纠正；‘左’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这是一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纲领，他郑重指出：“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口头上天天喊社会主义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过去立三路线就是这样，说打下武汉，就是社会主义的开始，结果不但社会主义没有到来，还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损失。”周恩来在这里强调对《共同纲领》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下去，可见他是相当注重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效果的。

在外交事务中，周恩来也一贯保持着他的现实主义精神，1969年，中苏之间爆发了严重的边境冲突。加之中、苏之间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唇舌之争，两国大战似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紧要关头，周恩来在北京机场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作了一次紧急会晤。他指出：中苏之间的争论不妨碍两个国家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并且建议应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这一务实性的冷处理得到了苏方的明确肯定，迅速缓解了两国边界的紧张局势。

毛泽东与周恩来性格特征比较

作者: [胡长明](#)
作者单位:
刊名: [新一代](#)
英文刊名: [THE NEW GENERATION](#)
年, 卷(期): 2005(12)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inyd200512037.aspx

关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断想

◎ 胡长明

毛泽东、周恩来政治合作的时间之长、内容之多打破了世界纪录，且具有令人神往的美学境界。研究者们用“海洋与海岸”、“航海家与水手长”、“董事长和执行董事”等各种形象的说法，力求逼近两人关系的本质。在中国政治史上，虽不乏两人并称的例子，但与“毛、周”相比，其逊色之处便不难立见。毛、周合作格局的奠定和延续，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其中文化性格上的差异和互补起了不小的作用，这里仅就两个问题略陈管见。

一、家族背景及其影响

韶山毛氏家族是典型的移民家族。元朝末年，始祖毛太华为避战乱，从江西吉水徙云南澜沧江畔，娶当地女子王氏为妻，生育八个儿子，并参加了朱元璋平定边疆的战争。明洪武十三年（1380），毛太华携长子毛清一、四子毛清四从云南来楚，定居湘乡北门外之绯紫桥。十余年后，毛清一、毛清四兄弟复卜居韶山，从此开始了在韶山艰难的创业史。“韶山风气，自鸡鸣而起，至篝灯不辍，习以为常”，一代一代的毛家人以此为发家兴族之本，硬是把一个陌生而蛮荒的地方变成了子子孙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氏家族已衍派到第22代。毛泽东属家族的第20代传人。据湖南省图书馆古籍部保存的1948年的《韶山地方毛姓氏概况调查表》所载，此时毛氏家族共有七千余人。

韶山毛氏家族的最大特点是具有从军打仗的传统，尚武精神十分突出。其始祖毛太华便是“以军功拔入楚省”。此后，他的子孙秉承他的刚毅与血性，投身行伍、闯荡天下者所在多有。特别

是近代湘军的兴起，更把家族的尚武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韶山毗邻曾国藩的家乡，得风气之先，故从湘军兴起时便有大批毛氏子弟加入其中。1881年《韶山毛氏二修族谱·凡例》记载：“自咸丰初起，小丑犯颜，兵戈扰攘，招募堵巢。吾族有志应募随征者不少，效力沙场，捐躯异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毛氏子弟从军的情况。据笔者遍查毛氏族谱，毛氏子弟参加了从湘军初兴到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次重大战役，并有63人在此过程中获得不同等级的军衔。清代军衔分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和外委十级，除总兵和游击外，其他军衔均在毛氏子弟获得过。其中毛正明、毛有庆、毛恩毅三人获提督衔。1868年，同治皇帝颁发诏命，称毛正明“智既深沉，才兼恢宏”，追封其父亲毛祖薰以上三代为“武功将军”，其母王氏以上三代为“夫人”。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以及民国初年的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中，又有毛家子弟“乘时而起”，为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而奋斗。

毛泽东便是在这样一个具有从军打仗传统的家族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父亲毛顺生、私塾老师毛麓钟、毛简臣、毛宇居等也有从军的经历。因此，家族的尚武精神对毛泽东性格的塑造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他儿时便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对《水浒传》、《说唐》、《三国演义》等描写战争的书爱不释手。一般来说，在尚武论兵习为风气的家族中更容易产生强烈的英雄崇拜倾向，这点在毛泽东身上反映得尤为显著。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他对华盛顿、拿破仑等一流的英雄豪杰倾慕不已，认为中国也需要有这样的人物。锻炼身体、热衷体力竞赛是他在东山学校读书时的一大特点。50年代，当年湘乡东山学校的同学去北京看望

他，他饶有兴致地回忆说：“那时我人虽然瘦，但个子高，打耍架时一般人还不敢轻易拢我的边。我和班上力气最大的某同学交战，他也只占了个平手。”这个细节活现出毛泽东当年尚武好斗的性格。

到长沙求学后，毛泽东的尚武精神更加突出了。为援助辛亥革命，他毅然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7年，他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开篇即云：“国力荼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同年，他还组织同学智缴了部分北洋军阀败兵的枪支。毛泽东无疑是一介书生出身，但又极其推崇武勇，热衷体力活动，敢于进击和冒险，这是他与一般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美国学者施拉姆在研究毛泽东时发现：“尚武，无疑是毛泽东个人性格中一个根本的特征。这个特征我们在毛泽东一生每个转折关头都能看到。”撇开特定的家族背景，我们就难以全面理解毛泽东强烈的尚武精神。

家庭生活环境对毛泽东思想性格的塑造也有重大的影响。他生长在一个典型的严父慈母的家庭。父亲毛顺生精明强干，性格刚毅而倔强。凭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他逐步跻身为韶山冲的“小财东”。母亲文氏性情温良，恺惻慈祥，随时愿意接济和帮助穷人。毛顺生在强悍的同时也失之褊狭，表现在家庭生活中，态度专横而粗暴，妻儿对他只能言听计从。毛泽东回忆说：“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要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表现在发家手段上，毛顺生严抠细算，有时自私到不顾亲情。他有个堂弟叫毛菊生，穷困潦倒，不得已要将赖以活命的七亩田产出卖。见有利可图，他急于要买进，而毛泽东和母亲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但他不顾反对，执意买下了这七亩田产。

毛泽东因为压抑和对父亲自私的不满滋长了浓厚的反叛意识，常常与父亲闹独立情绪。13岁那年，有一次父亲设宴款待生意场上的客人，嘱咐毛泽东殷勤待客。毛泽东讨厌那些繁文缛节，不愿奉迎。父亲当众骂他“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毛泽东。父子间发生了争吵。父亲更加恼怒，要动手打人。他愤然出走，父亲边骂边追上来。他跑到一个池塘边，恫吓说

如果父亲再走近一步，他就跳塘。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与反要求。父亲坚持要他磕头认错，毛泽东表示如果不再打他，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毛泽东由此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正是在与父亲的冲突中所形成的反叛意识和家族尚武精神的结合，奠定了毛泽东一生性格的基本色调。这种进击、外张、不愿牺牲真我的性格在青年时代展现得更为鲜明和丰满。他无所畏惧，劲直尚气，极度地张扬个性，呈现出浓烈的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气概。“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一豪迈的誓言妆点了毛泽东绚丽的人生。在湖南一师范求学期间，他常对同学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毛奇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青年毛泽东经常表现出惊世骇俗的举动和言论，他因故带头驱逐一师范校长张干，险些被开除了学籍；他将征友启事散发到女子学校，一时竟被误认为是不善之徒所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种轻视和挫折少年热情的根性，而青年毛泽东却大胆陈言：“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其推倒一时，开创新局之气概，跃然纸上。毛泽东终身爱好游泳，尤其喜欢在大江大海中搏击风浪，这倒不仅是为了锻炼身体，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借助这种方式表达生存意志，确证和张扬自己的本质力量。

当然，一个人性格的优点也总是伴随着某些缺点。对于自己性格上的缺点，青年毛泽东有过严格的自省。1920年6月7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励行规则的生活。”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给彭璜的信中又承认自己“论理喜极端，论人喜苛评”，“略有骄气”，并说：“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断断，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却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1988年，宋任穷在参观韶山时回忆了他在江西中央苏区亲眼所见的一件事：毛泽东和弟弟毛泽覃争论一个问题，毛泽覃不服，毛泽东很生气，像是要打人的样子。但毛泽覃也毫不示弱地说：这里

又不是毛氏宗祠！可见，一旦人的性格形成，无论其优点抑或是缺点都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其所属宝祐桥周氏尊周庆为始祖。周庆为迁绍始祖周茂第四代，歿后与妻合葬绍兴破塘殷家坞山麓，所以记载绍兴宝祐桥周氏族史的祭簿，称《周氏破塘祖生祭簿》。据该祭簿记载，周庆字德芳，赠文林郎，曾任山西道监察御史。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1939年3月，周恩来在绍兴宝祐桥周氏《老八房祭簿》中续写之谱系中写道：“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其中的“五十房”属绍兴宝祐桥周氏的一个支房。

如果说韶山毛氏家族呈现出“武略之美”的话，那么绍兴周氏家族则表现为“文事之优”，两者适成明显的对照。绍兴乃人文荟萃之地，仅周恩来所属的宝祐桥周氏在清代就出过两个进士，五个举人。在五个举人中，有四位是周恩来的堂伯父，即周毓鼎、周嵩尧、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元明以降，全国师爷大都出自绍兴，故有所谓“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师爷虽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却在中国行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明代理学家陈几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去绍兴当知县，文中说到，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胥吏全出自绍兴，胥吏的父兄教化好了，他们就可以教化好胥吏，从而做到天下大治。于此可见绍兴儒家教化的深厚传统。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在清咸丰年间追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下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

淮安周家的绍兴气氛是很浓的，所以周恩来总是强调自己“原籍绍兴”。对师爷的思想、工作作风、生活习惯等，周恩来非常熟悉。1964年他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沧州师爷也是绍兴人迁到那儿定居的），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另据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回忆，周

恩来曾向他们介绍过师爷的工作方法：为主管准备材料齐而全，并提出几种处理方案，供主管选择。

家族传统犹如一个“文化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多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在周恩来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其家族前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子，如**谦恭有礼、勤恳谨慎、精明干练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怀等**。周恩来的堂伯父周毓鼎为人忠厚，不善逢迎，也不喜欢做官，“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为人生归宿。他1907年做江苏巡抚陈夔龙的总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军李纯处当主任秘书。周恩来与他的交往颇为密切。周毓鼎的长孙周尔流说：“我们周家是个受儒教影响比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为清末举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经济上给七伯（即周恩来）一定的影响和支持，这都是肯定的。”英国作家威尔逊在研究周恩来时有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即为什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的确，周恩来在其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谋求最高领导地位的愿望，**尽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机会**。他一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才能为新的领袖所器重，成为领袖的一个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周恩来这种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是否也和他的家族传统有一定的精神勾连呢？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除了家族传统，家庭生活对周恩来思想性格的影响更为直接。他自己回忆说：“我出生后……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七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下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早年曾向舅舅鲁小和学做师爷，但未学成。他后来长期奔波在外，谋一些小差事，一个月的工资从未超过二十元。因此，周恩来是在浓厚的母教氛围中长大的。他以后多次说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是有影响的。**

周恩来虽然出身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辈已经衰落，家中的进益甚至不能维持生活。从6岁开始，他就随两位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搬迁漂泊。而且家中的变故也尤为剧烈，在9岁到10岁间，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幼小的他带着

两个弟弟在亲族人的帮助和接济下靠借债、典当度日，受了不少屈辱。这种家庭境况与毛泽东那个向上走的家庭也大为不同。周恩来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还提供了—个细节：少年周恩来在家中墙上贴了一张纸，按封建家庭的习俗，“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幼承家计的经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一定的办事和协调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柔中带刚，愈挫愈奋的心理品质。当年南开中学的校董严修便称赞周恩来有“宰相之才”。明乎此，有助于理解周恩来后来成为国务活动家的角色定位。

走出淮安的周恩来，常常被浓烈的怀乡思亲之苦所折磨。1916年秋，他在—篇作文中写道，“余幼失怙恃，依于从父，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首我伯叔而已。乃境遇所困，卒难遂愿。”有年除夕，同学们大都回家，他的这种感情更难抑制，写道，“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翻阅周恩来的旅日日记，这种怀乡思亲的文字更是俯拾皆是。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日记中写道：“想起来这个年，我们家里可以说是难堪极了。东西南北，分散各处。比着说，还是我处境稍优呢。扪心自问，我实在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了。”与之比较，走出韶山的毛泽东体验到的主要是一种摆脱了束缚的自由感，以及探索外部世界的乐趣。他很少写家信，假期更愿意与同学一道去游学，而不是首先想到回家，尽管他对父亲尤其是母亲也怀有很深的感情。

不同的家族传统精神和家庭生活境遇塑造了不同的基本性格。如果说走出韶山的毛泽东时常表现出一股英雄之气的話，那么走出淮安的周恩来则更多地表现出“服役”的精神。这种“服役”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家族伦理情感渴求的一种转换。在南开求学期间，周恩来说过：“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赖于公众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所以他在学校总是甘于默默地为公众做“服役”的事情，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正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说的：“课外事务，则如蝻集。东南西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视

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毕业时，《同学录》中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与“服役”精神相应照的，是那种谦抑虚受的品性。他从不锋芒毕露，而是事事处处想到“藏拙”。他和张瑞峰、常策欧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大家公认他出力最多，但周恩来却坚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1916年初，他在送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依拙，急流让尔贤。”这与毛泽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毫无疑问，毛泽东、周恩来在早年就怀抱救国救民之志，但他们的文化性格又各有特色，这正是他们能够引发研究者无限兴趣的一个原因。

—个人的性格除了受家庭背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所以，尽管毛泽东、周恩来性格的基本特征分别偏于“刚”和“柔”，但是后来长期政治生活的锤炼也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性格结构，因而构成十分复杂的多侧面的性格统—体。毛泽东曾以“虎气”和“猴气”自喻，而日本学者梨本佑平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周恩来的体内，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个见他的人，但他有时也是“尖锐严厉的”。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刚柔相济之人，毛泽东刚中带柔，周恩来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能够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大业的性格基础。

二、人生哲学的传统基因

毛泽东、周恩来都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并从中获益甚多，特别是他们的人生哲学带有明显的传统基因。

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核—心观念莫过于“内圣外王”。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推崇传教兼办事之人，把学问与事功的结合视为理想的人生境界。

“内圣外王”的概念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中的“内圣外王之道，闾而不明，郁而不发”，但它并不是道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而是儒家着力发挥并实践的人生理想。荀子说：“圣者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两者尽，是以为天下极矣。”由此可见，“内圣”指人内在的涵养和操守，即对人伦关系和准则的领悟和把握。后来宋明理学家将其发挥为对天命之性的保持，对气质之性的扬弃。“外

王”即是把主体修养所得推之于社会，将学问引向事业之途，达到社会的风同道一，由此也就实现了立德、立言和立功的三不朽。儒家的“三纲八目”是“内圣外王”的展开和具体化。“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其内涵，而“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实现它的途径和方式，由此形成一套严密的伦理哲学体系。“内圣外王”体现了儒家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对发挥主体能动性的重视，散发着刚健有为的气息。在历史上，这种人生观念的确锻造了许多关心国运民瘼的仁人志士，形成一种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

毛泽东接受“内圣外王”之道的影响，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杨师虽深受西洋哲学、伦理学之浸染，但对中国的儒家学说也十分推崇。在讲授修身课时，他不遗余力地阐发“内圣外王”的人生观念，热切期盼其弟子们以历史上的圣贤、豪杰为股鉴，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栋梁之材。毛泽东的读书笔记《讲堂录》有如下记载：“伊尹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为办事兼传教之人也”。由此可见杨昌济先生教书育人的基本倾向。他所要培植的“大本”，不仅要究明真理，学成大器，而且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建功立业的大家风范。只有如此，方为“尽心”、“完性”之人，也才是最理想的人格。

191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写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说：“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究为主，辅之政事时务。”蔡和森将胡林翼与曾国藩相比较，认为前者不如后者，“只缘胡凤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杨昌济先生的一片苦心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毛泽东十分重视“内圣”对“外王”的先导和决定作用，认为中外历史上虽然不乏品德学问欠缺而获得事功者，但其事业不能可大可久。那么，如何才能称得上“内圣”呢？毛泽东认为，领悟到宇宙的“大本大源”便是“内圣”的标志，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圣贤的基本人格和本质力量之所在。

从是否抓“大本大源”入手，毛泽东对一些历史人物的成败利钝进行了思考和分析。在他看来，被人奉为“圣贤先师”的孔子之所以百无不知，影响遍及列国，并没有什么神奇和谬巧，而“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曾国藩被人推崇为“立

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也是因为曾氏好讲“大本大源”之道，深悉“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他镇压太平天国，虽看重洋枪洋炮，但尤重“攻心”、“隆礼”，可谓双管齐下，标本兼顾。正是从这一视角立论，毛泽东评论道：“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还摘录曾国藩所作的《圣哲画像记》中的三十三人姓氏，表明了他对这些人的钦佩。

与孔子、曾国藩等人相反，青年毛泽东认为，李鸿章之所以在晚清内政外交方面捉襟见肘，是因为其不谙本源之道，比如“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功”。康有为变法失败，归因于他在文化选择上杂驳混乱，借穿孔圣人的绣衣而偷运西学，结果形成所谓“不中不西”的局面。故毛泽东说：“康氏似略有本源，然细观之，并无一杆独立，枝叶扶疏之妙。”至于袁世凯、张勋之流，则是“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就像“秋潦无源，浮萍无根”一样，免不了失败为天下笑的下场。

青年毛泽东在评判上述历史人物的时候，显然是暂时撇开他们事业上的是非曲直，而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进行抽象的思辨，即从“内圣”与“外王”的基本关系出发，寻找其成败利钝的关键，从而得出学无本源，则事功难立的结论。以历史为借镜，青年毛泽东决心“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短论短长，占去日力”。传统的致“内圣”讲求居敬笃静，把获得“大本大源”的过程视为一种神秘的内心体验。青年毛泽东对此有所超越。在他看来，人之所以无“内圣”，不仅在于没有“内省之明”，同时也因为“无外观之识”。也就是说，“大本大源”的取得离不开生活的历练和积累，这反映出青年毛泽东在认识论上有向注重实践方向发展的趋势。他愈来愈不相信“圣人”能够“从容中道”。相反，“圣人”都是“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

将学问和功业结合起来，“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的人生方向对毛泽东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人生目标，养成了毛泽东既重视理论又重视实践的特点。沿着这个方向，他既成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创立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用自己创立的理论武装人民的头脑，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规律来看，它也要求

其领袖既是理论家，又是实践家。这一要求，与中国传统的杰出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产生了契合。毛泽东就是这样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自我与救国救民融合在一起。“内圣外王”的传统人格理论作为一种纯粹而相对稳定的形式虽然还对毛泽东产生着影响，但其内容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毛泽东终身以作一个为人们提供思想、打开思路的人而自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他的方法是那种使人产生思想并投身于思想的创造以及从讨论中学习的哲学家和教师的方法。”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在会见老友斯诺时谈到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时说：“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 Teacher，就是教员。”毛泽东为何对教员这一称谓情有独钟呢？斯诺是这样分析的：“自孔子始，中国社会的统治者，都抱‘作人之圣’、‘作人之师’的心态，集权威、智慧、道德于一身，要求自己既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领导者，又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作为精通中国旧学的毛泽东显然受到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全国人民‘导师’的角色。”作为与毛泽东交往最为密切的外国人士之一，斯诺的这番见解是值得人们重视的。

毛泽东晚年还曾讲过自己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在毛泽东看来，秦始皇虽然建立了巨大的功业，但并无“内圣”之学。至于马克思，虽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但他自己没有成就“外王”之业。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的毛泽东身上，传统的“内圣外王”的人生观念虽然是作为一种形式和特征方面的东西而存在，但它毕竟是“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呈现出这样一种特点，即主体期望以自己的思想去塑造人而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秩序。但问题是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思想是一贯正确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革命的实践，说到底是他善于总结实践的经验和群众的智慧。而一旦偏离群众路线，自信太过，而又要将自己的

思想贯彻到社会生活中去，便难免会产生失误。

那么，与毛泽东相比较，传统人生哲学中对周恩来影响最大的核心观念又是什么呢？我认为道家所说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在其影响下，周恩来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的境界。

不可否认，周恩来生长在一个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青年时代更是强调“诚”，注重“人格”力量，主张待人处事要“端赖良心”，特别富于道德践履精神，因此也很容易让人将他与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联系在一起。周恩来的许多优秀品质如积极人世、忧患意识、彬彬有礼、仁慈厚道、清廉俭朴、忍辱负重，确也能从儒家文化这个庞杂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渊源。中外学者有关周恩来与儒家思想精华之关系的评论所在多有。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指出，周恩来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刚毅”。国内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周恩来积极投身革命，一辈子改造世界观的实践，一定程度上打上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烙印；他全心全意为人民、和蔼可亲的品格，又有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色彩；他深入虎穴、临危不惧，身居高位，廉洁奉公的情操，又是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生动体现。这些见解虽然说都可以成立，但似乎没有捉摸到周恩来人生哲学的底蕴。

其实，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对老子哲学也怀有相当的敬意，甚至有明显的扬老抑孔的思想倾向。春秋时代，社会秩序失范，异说竞起。周恩来在解释孔、老哲学产生的原因和用意时说：“且孔氏亦值是时，尼山设教，倡仁义之说，秉先王之法，学者风从，几移完域。老氏际此，其不入于孔者几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礼之日，未尝不嘉孔氏之志。惜所言未尽脱于羁攀，所行又多限于绳规，乃不得不超乎世俗，为忿世嫉邪之言，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争，宁退让保故有之我。弃礼灭义，剖斗折衡，岂无因而发哉？”世人认为，老子主退让，失去了竞争之旨，周恩来认定此乃“失察”之见，他说：“世人假礼义以济私，恃斗衡而犯禁，老子要不得不有此激耳。不然，老氏既主退让之旨，又何为道德五千言，发为文章，与孔氏争学理之长短哉？”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

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认为他们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变的真谛。在他看来，孔教、耶稣教、佛教三者“非不善也”，“然其于生死存亡之观念，未免后于老、赫也”。可见，青年周恩来十分推崇老子哲学那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对于周恩来的见解，他在南开中学的国文老师深有同慨，评论道：“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灭之识，始能不朽。若拾人牙慧，不越宿而腐矣。”并称赞周恩来能将老、赫二氏“救世之心，曲曲传出，识见迥不犹人”。旅日期间，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将“自然的妙理”与“进化的轨道”并称，正是南开时期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的旨趣之延伸。

正因为早年便对老子哲学有过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研究，所以周恩来后来与人谈及老子哲学时也颇能驾轻就熟。1939年，他在故乡绍兴与《战旗》杂志社的曹天风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曹天风说：“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无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却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利关、美人关’。”这时周恩来反问道：“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曹天风一时回答不上来，周恩来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幸，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从老子五千言中选出这十二字作为最精彩的话，显然是比较推求的结果。虽然周恩来在三十年代才讲这番话，但这个认识应当说在青年时代便形成了，因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幸”正是道家自然主义宇宙观和人生观最为典型的表达。

《道德经》云：“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又说：“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幸，是谓玄德。”这就是说，虽然“道”使万物产生、繁殖、成长、发育、结果、成熟，但又不据为己有，不恃为己功，不主宰他们。所谓“不有”、“不恃”、“不幸”，即“不以有为有”，不把有当做有。“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正因为有而不有，所以才有有，这就叫做“玄德”。老子在这里阐述的本来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但它却可以转化为一种崇高而智慧的人生观，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

谁都承认，周恩来有儒家和墨家那种积极入世、励志勤苦的精神，对世界、对人类有脱不开的情缘。他像他所推崇的诸葛亮那样真正做到了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只要仔细寻味便可发现，周恩来又呈现出一种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点，他对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够忍受劳苦乃至屈辱，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光和热，给世界留下了深厚的遗爱。**人们往往惊叹他做入世之事的专注和投入，却很少去考量在这种态度的背后还有何种精神底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幸”最能传达出周恩来人生哲学的神韵和境界。他在青年时代就乐于为公众“服役”，但这种“服役”绝没有什么功利色彩，而几乎是出自道德上的“绝对命令”。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幸”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周恩来的头脑中产生了共振效应，从而使他一步一步迈向人格的巅峰。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勤恳奉献，任劳任怨，即使在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也从未想过置身事外。他身居高位，但又不盛气凌人，提出“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追求管理上的“无我之境”，正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幸”的重要体现，而且也与道家所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相贯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现，周恩来在谈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时，总是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毛泽东一人。他对任何宣传他个人的形式和内容都加以劝阻。江苏淮安县委多次提出，要以他的故居所在地办个纪念馆，他始终没有同意。周恩来对功劳缄口不言，但对错误却“公之于众”。他认为，“错误要逢人就讲，既可取得同志的监督和帮助，也可以给同志以借鉴”。1961年，有次他在上海与文艺界人士座谈时，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说：“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党内，周恩来作检讨的次数恐怕是最多的，他动辄讲自己过去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某些错误，以至陈毅后来都有了厌倦之感，说你那点事我们都知道了，用不着再说了。

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曾特意将《史记·汲黯郑庄列传》推荐给周恩来阅读。汲黯、郑庄为汉武帝时两位有名的宰辅，而且都服膺道家思想，习治黄老之术。也许是毛泽东赞赏汲黯、郑庄不谋私利，忠心为国的高尚品德，认为他们与周恩来的为人有某些内在的联系，所以才将他们的传记推荐给周恩来。1973年3月

26日5时，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事实上，周恩来比起汲黯、郑庄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周恩来的人生充分体现了“不以有为有，因

此才有有”的人生哲理和大无大有的辩证法。他一生公而忘私，又终不言，死不留灰，属于那种事情做完，转身即走的人。他彻底回到了本真状态，但他的遗爱和精神又长留人间。

叩问《沁园春·长沙》

◎ 彭明道

我曾经虔诚地读过一百遍，今天我又以同样虔诚的心轻声叩问。

——作者读诗手记

一、词的写作时间是怎么确定的？

《沁园春·长沙》，诗人毛泽东的早期力作。那“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胸襟，“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魄，四十多年前就已使我以及像我一样的千百万年轻人人为之倾倒。

而今，我已经年过花甲，诗人在那里坦露的气魄胸襟所给予我的激动，大多已为沉思所替代。在读了一大堆政治家毛泽东的传记（包括中国和外国作者撰写和出版的）和中共党史资料后，我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这首词究竟写于什么时候？

对于作为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这关系到对他早期思想成长历程如何认识的问题。

兹事体大。我长时间战战兢兢地轻声叩问，追寻。

《沁园春·长沙》，最初发表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的《诗刊》创刊号上。总题目是《旧体诗词十八首》。此词赫然列于篇首，词牌和标题下无写作年月。同时发表的还有毛泽东“致臧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的《关于诗的一封信》。这在当时是一件颇有“轰动效应”的事。因为在此之前，中国老百姓大都只知道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文人们虽大略知道毛主

席“雄才大略”，却不曾想伟大领袖同时竟又是伟大的诗人，能写出如此气吞山河、境界高远、声律悠扬的绝妙好词。应该说，《旧体诗词十八首》在新中国建立后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党和毛泽东个人的政治威望日益高涨的时候公开发表，对于作为党和国家伟大领袖的毛泽东，又奠定了一个伟大诗人的地位，这是令人欣喜的事。

然而，这次发表的《沁园春·长沙》，并未标明写作时间。

接着，在一九五八年，文物出版社将这些诗词结集出版。因为湖南师范学院院刊在当年元旦公开发表了毛氏的新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故文物出版社便将此词收了进去，将书名定为《毛泽东诗词十九首》。这是第一次正式出版毛泽东的诗词集。为了表示对作者的尊重，文物出版社特地出了个宣纸线装直排的大字本。其中的正文，都是从一部刻工精美的宋版书中单字挑出，单字照相制版的。这在中国的出版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如今，私人藏书中拥有这个版本的恐怕不多。它已经弥足珍贵了。毛泽东同年在广州时，对自己的诗词作了一些解释和批注，就是写在这个版本的天头上的。在这部精美绝伦的诗集中，《沁园春·长沙》仍然未见标明写作年份。毛氏在此词的天头上，只写了下面这段话：“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数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在这里，作者自己也未为它标明写作时间。

关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断想

作者: [胡长明](#)
作者单位:
刊名: [书屋](#)
英文刊名: [THE STUDY](#)
年, 卷(期): 2001(7)
被引用次数: 2次

引证文献(2条)

1. 刘绪义 [“江湖”与“庙堂”:湖湘文化的历史吊诡](#)[期刊论文]-[湘南学院学报](#) 2004(4)
2. 彭杰 [家族尚武传统对毛泽东的影响](#)[期刊论文]-[浙江体育科学](#) 2003(4)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huw200107002.aspx